

中缅关系的分裂与正常化:1967—1971 年

范宏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1967 年 6 月, 仰光发生排华事件, 导致中缅关系分裂。初期, 双方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 相互指责、攻击。从 1968 年开始, 两国都开始不同程度减少对抗, 缓和与对方的关系, 开始重新接近。1970—1971 年, 北京与仰光重新互派大使赴任, 1971 年缅甸最高领导人奈温应邀访华, 中缅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关系的破镜重圆, 主要源于双方各自利益的需要, 其次, 国际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 也是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中国; 缅甸; 反华

中图分类号: K3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8)04-0073-06

作者简介: 范宏伟(1973—), 河南南阳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缅关系研究。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 两国建立了较为亲密的邦交关系, 中国也将两国关系视为发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典范, 和平共处的榜样。但这种“典范”关系随着 60 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左转, 逐渐实行激进的革命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对外交领域的失控, 在 1967 年恶化。本文所考察的即是中缅交恶后, 双方如何努力使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轨, 以及这种努力背后的意义和原因。

一、中缅关系的分裂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后, 也逐渐波及、影响到缅甸华社。1967 年 6 月, 仰光部分华侨华人学生因佩带毛主席像章上学而与校方发生冲突, 随即学生受到仰光中国使馆极左派的支持, 矛盾日益激化。6 月 26 日, 仰光发生反华暴乱。仰光数十位华侨遇害, 伤者众多。十余个华侨社团被焚毁或捣毁, 大量华侨华人店铺、企业、住宅、财物被砸抢

和焚掠。中国驻仰光大使馆被暴徒围攻, 援缅专家刘逸被杀害。新华社仰光分社、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驻仰光办事处、中国使馆经济参赞处的办公机构也被多次围攻, 办公物品被烧毁。6 月 28 日, 军政府在仰光实行戒严, 反华暴乱基本停止。

北京的反应: 6 月 28 日,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召见缅甸驻华大使信瓦璘, 向其提交一份抗议照会。照会指责缅甸政府唆使和纵容暴徒发动排华事件, 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要求缅甸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同日, 中国驻缅使馆临时代办肖明, 就排华事件向缅方提出最最强烈、最最紧急的抗议, 并提出五点要求: 缅甸政府严惩凶手, 抚恤受难家属, 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 保证中国使馆和人员的安全, 立即停止对华侨的法西斯暴行。

6 月 29 日, 北京发表公开声明, 重申中国政府的五项要求, 再次提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 决定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1949—1988)”(课题编号: 05JC770032)

收稿日期: 2008-01-20

“将根据情况的可能发展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1]。6月30日,《人民日报》首次就缅甸排华事件发表评论。社论认为仰光的暴乱是“反华法西斯暴行”,“完全是缅甸反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策划制造的”。缅甸政府想借此摆脱统治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同美帝苏修相勾结,充当反华的打手^[2]。

6月29日至7月3日,北京每天平均有数十万人到缅甸驻华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声援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要求,参加示威游行累计达到100多万人。其中,在7月3日的游行、抗议过程中,出现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同期,上海、昆明也连续多日举行抗议缅甸排华的示威游行和集会。

缅甸排华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对缅甸军政府以及奈温个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攻击,奈温及其政权被指责为“走狗”“反动派”“法西斯”和“反革命”等。据统计,仅《人民日报》从1967年6月29日至12月,共发表攻击缅甸的文章153篇,其中高峰时期的7月为75篇,8月33篇。

此外,缅甸反华后不久,中共就明确表示支持缅甸国内的革命力量。1967年7月1日,北京广播了缅甸国内革命力量支持华侨、反对政府排华的声明,并将其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缅甸国内革命力量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我们要和他们紧密团结”,战斗在一起,支持缅甸人民在其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大造奈温政府的反^[3]。次日,缅甸革命领导人在援缅专家刘逸的追悼会上,肯定、支持缅甸华侨的做法,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活动^[4]。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缅甸革命力量,祝贺其成立28周年,支持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

仰光的态度:对北京的反应,缅甸政府初期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6月29日,北京20万人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举行示威,当日缅甸政府向中国提交备忘录,对此前中国提出的五点要求置之不理,要求中国政府制止游行,但缅甸政府的要求被中国拒绝。缅甸政府收到肖明代办6月28日的抗议后,否认排华事件系缅甸政府策划,宣称仰光事件是缅甸内政,中国使馆无权干涉。

虽然,仰光的排华在6月28日基本平息,但排华、反华的风潮开始向整个缅甸扩散。从6月30到7月15日,缅甸彬文那、东枝、卑谬、毛淡棉、敏建、土瓦、贝塞因和勃生等281个城镇举行规模不等的

反华“示威”或集会。

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缅甸媒体也纷纷刊载反华、反共的文章,指责中国人的无理行为,声援政府。为了回应北京指责军政府在缅甸制造白色恐怖的说法,缅甸媒体还报道了一些华侨支持缅甸政府和部分华人参加反对北京的示威游行的事例,并号召当地华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反抗所有“邪恶”的力量^[5](P36-37)。

仰光反华以后,军政府对亲北京的华侨领袖、骨干以及社团进行监控,并逮捕了一些华侨。虽然,这引起中国方面的多次抗议和警告,但缅甸政府坚持对被捕的华侨进行审判,以“挑动学生闹事”“制造骚乱”和“惊扰群众”等罪名,判处他们刑期不等的徒刑。相比之下,刺杀中国援缅专家刘逸的凶手只以“非法入侵”罪,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此外,军政府还清除了国内亲华的政治力量,约有100多人被捕,部分人被驱逐或转入地下,其中包括缅中友好协会、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官员^[6](P117)。

从6月28日开始,军政府对仰光华侨集中的街区和中国大使馆进行长时间的军事管制,北京为此提出抗议。7月,中国通知缅甸要运送一些蔬菜、水果和药品等物资给仰光的中国大使馆,以救济使馆和处境困难的华侨。缅甸方对此表示反对,当中国坚持把救济品运抵仰光后,所有物资被扣留。此外,缅甸拒绝中国政府派飞机到仰光接运重伤的华侨回国治疗。8月,中国再次试图空运救济物资给仰光中国使馆,未获成功。中国使馆要求派人调查暴乱事件和探望伤员,也遭到奈温政府拒绝。

9月初,中国拟派遣一个由华侨事务委员会组成的调查慰问团,携带救济物品前往缅甸进行调查慰问,被缅甸方拒绝。同月,缅甸撤回驻华大使。10月,缅甸照会中国,要求中国撤走援缅专家和技术人员,到1967年11月4日,中国援助缅甸专家和技术人员412人分三批全部离缅回国。

1967年7月和1968年1月,新华社仰光分社记者于民生、滕文启、李成义、刘德金被缅甸政府相继驱逐出境。1968年3月19日,缅甸政府又出动大量警察“清查户口”和“核对身份证”,逮捕了大批居住在仰光和缅甸各地的各华侨团体负责人和华侨。3月20日和21日,在曼德勒、毛淡棉、勃生、密支那、八莫、腊戍、东枝等地,也有许多华侨被捕。此外,还有一些亲大陆的华侨被驱逐出境。

二、中缅关系的正常化

从1968年开始,两国都开始不同程度减少对

抗,缓和与对方的关系。中国媒体虽然继续对仰光进行谴责和攻击,但数量和频率大大降低,措辞也明显没有以前那样尖刻,很少再使用“反动派”“法西斯”等词汇。

从1968年夏季开始,缅甸不再公开指责中国为叛乱者提供训练和庇护,而开始将此更多地称为一个当地事件^{[7] (P476)}。缅甸对中国的攻击逐步转为对缅甸国内革命力量和其他反政府武装的声讨,反华示威以“工作抗议”的形式进行,号召工人用无偿劳动来支持政府,反华情绪被政府小心巧妙地利用,缅甸人对中国的谴责不再那么直接^{[9] (P37)}。

1969年1月,奈温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同中国官员商讨两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问题。1969年,仰光决定停止军队在中缅边境的巡逻,以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1月,奈温在缅甸纲领党大会上表示,我们想同我们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至于中国,我们想同它恢复以前的诚挚、友好的关系。这需要双方的努力。就我们来说,我们只是想抚平1967年事件的伤痕。尽管边界地区存在冲突和现在的状况,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来恢复传统的友谊,不使局势恶化。我们认为1967年事件是不幸的。我们愿意根治这一创伤,忘记令人不愉快的事件”^{[8] (P695)}。

此外,双方都开始邀请或参加对方举行的一些节庆活动。1968年7月19日,中国驻缅代办参加缅甸烈士节纪念国父昂山的活动,并在其墓前敬献花圈。1968年10月和次年8月,一些缅甸官员、社会人士出席了中国驻缅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和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1970年1月3日,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出席缅甸使馆举行的缅甸独立庆祝活动,新华社对此还进行了报道。

北京与仰光从1968年开始试图重新接近,但初期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比较慢。从1970年中期开始,这种状况有了明显变化。

首先,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向缅方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1970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外交使节和官员时,向缅甸临时代办致意,并请其转达对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的问候。1971年8月,周恩来在与来访的奈温会谈时特意提到了这一细节:“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9] (P483)}

其次,参加节庆活动官员的级别和人数明显提

高和增加。1970年10月1日,缅甸代理外长、副外长、仰光军区司令等高官参加了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招待会,当日缅甸最高领导人奈温还致电周恩来,祝贺中国国庆。1971年1月4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出席了缅甸使馆举行的独立节招待会。8月1日,缅甸部分高级军官参加了中国使馆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再次,两国大使重新赴任。1970年10月,仰光任命吴登貌为驻华大使,11月16日吴登貌到达北京。1971年3月,中国新任驻缅大使陈肇源,抵仰赴任。至此,由于1967年仰光排华事件恶化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

最后,奈温应邀访华——中缅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8月6日—12日,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应邀访华。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奈温一行,周恩来同奈温进行了5次会谈,就中缅关系、在缅华侨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六二六”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恩来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奈温表示要对1967年仰光事件中遇难的华侨进行赔偿,并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说:“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和工作。”“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9] (P484)}

1971年奈温访华之所以标志着中缅关系的正常化,除了这一访问本身意味着从1967年中断的两国高层外事访问重新开始以外,更重要的是,奈温访华期间,双方就1967年仰光事件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中国对缅友好和平政策的重申,缅甸向中国表示继续坚守和平中立外交政策的承诺,为两国关系此后的正常、顺利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奈温访华后不久,中国应缅方要求,恢复因1967年事件而中断的援助缅甸的计划。

三、中缅关系正常化的原因分析

中缅关系从1967年分裂到实现正常化,历时四年完成。这首先是当事双方互动与努力的结果,其次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演变,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也是推动双方和解的重要外部力量。

缅甸视角的分析:

仰光事件的直接原因虽是中国国内极左路线所

致,但也是缅甸军政府利用极端民族主义,转嫁统治危机,寻求政治合法性的策略。1962年奈温军人政变上台以后,军政府就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特别是其实行的激进的经济政策,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动荡。然而1967年的形势最为严重,缅甸出现米荒,市民、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政府面临空前的挑战。“而此时华侨的像章事件正好让政府利用‘反中国人’的气氛,来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10] (P187)}。“奈温将军把国内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把国家拉向自己这边,使华人成为缅甸人愤怒的目标,给军队一个喘息的机会”^{[11] (P66)}。

仰光反华虽然有其内政因素,但缅甸政府同时也将事态的发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仰光并不想同北京彻底决裂。反华后,缅甸从北京撤回大使,但并没有同中国断交,也证明了奈温的这一意图。另外,从反华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来看,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排华相比,仰光的排华还是比较“温和”的。除仰光华侨的生命、财产损失较大以外,其他地方的排华仅局限于一般的反华抗议和示威活动。

仰光对排华以及此后缅甸国内形势的控制,同缅甸对当时中国国内非正常状况的判断和认识有关系。1971年奈温访华时,向中方介绍了缅甸当时的判断和决策过程:“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12] (P287)} 缅甸在排华中以及随后与中国的对抗中,采取一定克制的态度,没有借助美苏进行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并保持外交关系,为中缅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客观基础。

奈温以华侨像章事件为突破口来巩固其统治的冒险尝试,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其根本外交政策并未发生改变,并没有因此倒向美国或苏联,仍然坚持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1968年3月,奈温表示,我们要靠自己奋斗,不依赖他国。尽管发生仰光事件,尽管别人向我们挑衅,我们不会放弃中立政策^{[13] (P55)}。这一点是中缅关系在短期内能实现正常化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对于缅甸既反华又坚持中立政策的矛盾做法,如果我们了解其对外政策的本质和目的后就不难理解了。

缅甸独立后不久就确立了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主张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不卷入任何纷争,同所有国

家保持友好关系。在促使缅甸实行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提出:“缅甸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北方有7亿中国人这一不可改变的原理之上的。”^{[14] (P24)}“缅甸的不结盟政策主要是保证缅甸领土不被中国侵略,避免被战争破坏。”^{[15] (P122)} 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曾这样总结缅甸内外政策的本质:“独立这句话对于缅甸人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是缅甸国内外政策的最高目的。”^{[16] (P231)} 换句话说,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处于冷战夹层地带的缅甸,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和需要更加小心谨慎。而中国在仰光事件后的反击则更坚定了缅甸的上述看法。

1967年6月,仰光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除组织国内民众集会、游行抗议反华,不断提出不同级别的抗议和声明,发动舆论宣传攻势声讨对方以外,还公开支持缅甸国内的革命力量,这使得奈温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为此,奈温呼吁国内不要因此言辞激烈或采取过激行动,防止1967年的事件重演。奈温害怕事态继续恶化,进一步危及缅甸国内的稳定和国家安全^{[17] (P91)}。此外,1969年,被奈温赶下台的缅甸前总理吴努公开宣布,他将寻求包括美国、中国和苏联在内的各方的军事援助,重新夺回政权。1969—1970年,吴努实际上已经与克伦、孟族反政府武装结盟,试图联合起来推翻奈温政府^{[18] (P172)}。

1970年,缅甸终止美国自1958年开始实施的军事援助计划,美国驻缅执行该计划人员1971年6月底全部撤离,随后美国表示愿意以极低价格出售剩余装备,也被缅甸拒绝。同时,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拒绝签署缅苏双边安全协定,再次显示缅甸不愿进一步激怒中国。

中国方面的解释:

了解导致缅甸排华的中国因素以及它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的关系,是我们考察北京在中缅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逻辑起点。缅甸排华直接起因于部分华侨在中国使馆的支持下,违反当地法令,模仿国内“文化大革命”,佩戴毛主席像章、学习毛主席语录,并同缅甸当局进行对抗,从而导致冲突发生。

1966年“文革”开始后,极左派凭借权力,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展开,全国动乱升级,中国的外交领域也陷入了混乱。这一时期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向斯诺所说的: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

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19] (P163)}。

中共中央对外交领域的一度失控,既是仰光排华的诱因,也是进一步促使随后两国关系分裂的主要因素。1971年,周恩来向来访的奈温表示:“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9] (P481)}但事态的发展显然不能完全由周恩来所控制,仰光中国使馆的极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分裂。

1967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重新掌握外交大权,开始逐步纠正外交领域的极左做法,这实际上是北京随后调整与缅甸关系的前提和转折点。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把中缅关系的正常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政局变化的结果,其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外交政策和策略在这一时期逐步发生变化。

1960年代初中国开始逐步实行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文革”开始后发展到顶峰。这种激进的政策使中国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同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的状态。从1968年开始,北京开始在政策和策略上进行调整,试图扭转这种被动、混乱的局面。1968年5月,毛泽东批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提法是“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多次批示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20] (P274-276)}。1970年初,中共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6月外交部革委会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在具体外交活动中,北京不断向外界表示其努力和各国发展关系的意图。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以表示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与8国新任驻华大使合影,8张照片全部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不久,中国重新向国外陆续派出使节,采取措施修复因极左行动而被破坏的双边关系。1969—1971年,除缅甸以外,中国还先后与朝鲜、南斯拉夫、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等外交往来中断的国家恢复关系,与加拿大、冰岛等20个国家建交。

1968—1971年,北京从最初逐步减少对缅甸舆论攻击、向缅方灾民捐款、邀请或参加对方举行的一些节庆活动,到最后邀请奈温访华,这些举措是中国扭转“文革”初期外交关系混乱状况,改变自我孤立

的步骤之一部分。中缅关系正常化,是当时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结果。

此外,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推动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实现与各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中、美、苏三角关系视角下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战后20多年的分化和整合,国际关系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

首先,这一阶段苏联不断推行对外扩张战略,在与美国的争霸中逐渐占据优势。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苏联在同蒙古签订了秘密的军事条约后,向蒙古派驻了大批军队,到1969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部署了100万的兵力,给中国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两国边防军在新疆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同年,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新加坡和柬埔寨列为成员国,形成一个反华的战略包围圈,孤立和包围中国。

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苏联逐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危险,而这一变化对于本文所探讨的课题来说,主要具有以下影响:其一,迫使中国改变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做法,放弃对一些亚非拉国家内部革命的支持,修复被破坏的对外关系,寻求突破苏联反华包围的出口;其二,中国领导人开始探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着手进行对外战略、策略的调整,以改变当时的处境,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这也就要求北京必然不能允许外交领域的无序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越和解的开始,导致中国的战略防御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这种转移重新凸现缅甸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其次,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调整对外政策,实行全球战略有限收缩。尼克松主义把苏联作为头号敌人,把中国看做是潜在的威胁,争取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中美关系的缓和与联合,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纠正极左革命外交政策,中缅关系正常化是这种调整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面,缅甸努力和中国重修旧好固然主要源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中美联合的示范效应以及在其他国家中引起的连锁反应,无疑会减少缅甸的顾虑,加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

是促使中国摆脱“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定位,寻求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渠道的重要原因之一。三者关系相互联系和影响,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成中缅邦交正常化的大背景。

再次,仰光事件后,苏联、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在外交、经济、技术上援助、支持缅甸,缅甸还与美国签订了安全协定。美苏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同缅甸的接近,使处于安全困境、外交孤立中的中国不得不考虑恢复同缅甸的传统友谊关系。

四、结语

中国从1954年确定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到从1960年代初逐步突出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对外政策中的指导意义,直至“文革”开始后否认国家利益,实行激进的革命外交政策,中国外交经历了从联合、统战到自我孤立的过程。1967年的中缅关系分裂即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突出个案。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N].人民日报,1967-06-30.
- [2] 缅甸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反华暴行![N].人民日报,1967-06-30.
- [3] 首都红卫兵愤怒声讨奈温反动政府[N].人民日报,1967-07-04.
- [4] 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N].人民日报,1967-07-06.
- [5] Ralph Pettman. China in Burma's Foreign Policy[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 [6]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 [7] Wayne Bert. Chinese Relations with Burma and Indonesia[J]. Asian Survey, 1975, 15(6).
- [8] Robert A. Holmes. China—Burma Relations since the Rif[J]. Asian Survey, 1972, 12(8).
- [9]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10] 今川瑛一. ネ・ウイソ軍政下のビルマ[M]. 東京都:マヅマ評論社,1971.
- [11] Josef Silverstein. A New Vehicle on Burma's Road to Socialism[J]. Asia, 1973, (Spring).
- [12] 陈扬勇.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13] 张国忠. 缅甸与中共关系(1950—1990)[D]. (台湾)政治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95.
- [14] Jerry Rose. Burma and the Balance of Neutralism[J]. The Reporter, XXVIII, No. 1, January 3, 1963.
- [15] David Wen-wei Cha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utralism of India, Burma and Indonesia[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 D., dissertation, 1960.
- [16] D. G. E. Hall. Review on “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J]. Pacific Affairs, 1964, (2).
- [17] 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 [18] Kalyani Bandyopadhyaya. Burma and Indone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y[M].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1983.
-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孙景峰]